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大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
语境下的文学理论转型

肖明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END OF THE WORLD

本书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ZW009）的阶段性成果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大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
语境下的文学理论转型

肖明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理论转型 / 肖明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 - 7 - 5203 - 0844 - 1

I. ①20… II. ①肖… III. ①文学理论 - 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475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48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陶东风

20 世纪 90 年代所发生的文学理论转型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也因此有不少的研究著述以此为研究对象。杨颢早在 2001 年就写了名为《90 年代文论转型》的专著。杨俊蕾也有涉及 90 年代文论转型的专著《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陈庆祝、葛卉则分别从接受和话语权力的角度对 90 年代文论转型做了研究。2014 年，又有陈力的一本相关专著出版。此外，在文学理论学科史的一些回顾性和反思性的研究著述里，也有对 90 年代转型问题展开专门研究或间接论述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 90 年代文论转型会成为密集关注的研究对象呢？

毋庸置疑，由于历经重要社会历史事件，90 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对此，我曾经写了《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一书予以关注。学界也有不少相关文献涉及此问题。比如，对于知识分子形象的变迁，出现了诸如从“精英”到“大众”，从“批判型”到“专家型”，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各种说法，甚至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俨然成为“知道分子”。知识分子的这种变化，必定影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一方面，它使得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出现专业化和体制化的趋向。这当然也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社会条件自身因素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文学/文化的社会存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文学理论学人选择主动转型，试图把握变化了的现实，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研究就是其中之一。1993 年，我在《文艺争鸣》杂志发表《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一文时，大概就开启了我的这种选择。虽然我后来反思了这篇文章在理论资源的使用和知识立场的选择上存在一定局限，但我认为它所代表的学术转型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应该说，这种转型是社会现实之需。

这样说来，知识分子身份变化所导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和

体制化与社会文化现实所要求的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二者之间就难免发生冲突。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冲突的“缓和”并不必然需要以“悲剧”的形式告终，它完全可以在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把冲突“中和”。因为，一方面，文化研究有回应现实的内在需要，在理性的公共运用之时并非完全地推迎俯就，如“技术专家”和“御用知识人”一样丧失清明的理性和必要的批判性。换言之，文化研究始终不会因为专业化、体制化便放弃知识分子的底线。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在回应现实之时，是对文学/文化乃至整个的社会历史文本进行专业阐释，也即是有获取知识的诉求。这就避免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所可能带来的情绪化弊端。恐怕正是基于此一考虑，我对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研究是有认同感的，曾经也为推动这种转型做了一些努力。但是，这种转型是艰难的，转型本身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毕竟，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变化了的现实有不同的理解，每个人对未来的想象也不尽相同。因此，在从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之时，人们就会选择不同的学术资源、知识立场和价值取向，而且这种选择还不完全是一种主观行为。从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看，这恐怕是由其在场域中的占位情况所决定的。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界的相关论争还在继续，这恐怕印证了这种转型的艰难，说明了它的确是一个“问题”。如果将文学、文化和文论问题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社会共识渐趋消失、阶层分化越发明显甚至“断裂”等语境关联起来，我们还可以说，文学理论转型之所以“艰难”，之所以是一个“问题”，它是有社会原因的。为此，我们就有必要对转型问题展开合乎具体历史语境的分析。肖明华的《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理论转型》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展开的研究。因此，他此书的标题看起来很朴素，但却是有深意的。这也是我当年建议他使用的博士学位论文标题。

前几天，肖明华打电话告诉我，他的博士论文要出书了，希望我给他写个序。我欣然答应了，并很快回忆起当初阅读他博士论文的经验。我觉得他的书稿有这样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其一，该书将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放置在了大众文化兴起、现代性反思发生和身份政治凸显等社会文化语境中予以观照。这使得此书有一定的思想史特点，同时也使得他的文学理论转型研究有较强的历史感和较大的深度。其二，把文论转型问题当成文学基础理论来展开研究，也就是在学科意义上探讨这种转型。

这是其鲜明特点之一。其三，抓住转型的艰难，将文学理论转型问题置于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之争这一具有知识型意义的认知框架下展开。这是其他相关著述较少自觉做到的。其四，能够落实到具体的“学案”中去。着重探讨了理论的批评化、文化研究、文化诗学、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几种与转型有关的理论话语，并对相关争鸣进行了再讨论。其五，此书颇有一些创建，比如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出现了“大文学理论”转型，认为文化诗学要调整对审美、大众文化的理解，认为后殖民批评被误读的学理原因与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有关，等等。这都是值得重视的。也因此，此书相关部分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并有转载引用。此外，肖明华的这本书稿在文献梳理上下了功夫，在学术讨论时有可贵的对话意识，并且表现得很真诚。凡此种种，使肖明华此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不至于在同类著作中湮没。这是我感到庆幸的。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也肯定了其博士学位论文的价值。

肖明华是我200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指导的博士生。记得他的论文选题颇费周折，我曾经建议他写“1993年的文学事件”，也曾经认同他自选的“海德格尔在中国的接受”一题，但最终都放弃了。最后，选择了他最有言说冲动的文学理论转型问题。现在，一晃过去这么多年，论文也终于要出书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作为他的老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值得一提的是，博士毕业后，他还写了另一本有关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书。前些日子，我已经给他写过序了。我感到他的学术道路似乎越走越宽广，但我希望他继续努力，接着展开文学理论的转型研究。诸如更理论地“概括”描述文学理论的转型，转型之后的文学理论基本观念的建构，具体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和个案研究，等等，都是值得继续深入展开的。我甚至觉得肖明华还可以做一些与“八十年代访谈录”“七十年代”相类似的“九十年代”的研究工作。在我看来，这是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研究所需要的“感觉结构”和“历史视野”。肖明华有了“九十年代”的文献基础，再增加一些历史感和跨学科训练，我相信他将来会在当代文论研究中取得更大成绩。

是为序！

2016年12月26日于首都师范大学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理论的批评化”与90年代文学理论如何可能	(20)
第一节 “理论的批评化”的提出	(21)
第二节 “理论的批评化”的相关问题及其讨论	(26)
第三节 转型视域中的“理论的批评化”再思考	(32)
第二章 文化研究：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一种方案	(39)
第一节 文化研究发生的特点与文学理论转型的方式	(40)
第二节 大众文化研究的践行与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 展开	(44)
第三节 文化研究的合法化及其作为文学理论转型的 一种知识方案	(75)
第三章 文化诗学与90年代文学理论的“通变”如何可能	(82)
第一节 文化诗学的提出：一种文学理论转型的可能	(83)
第二节 文学诗学的“通变”：一种文学理论转型的方式	(89)
第三节 文化诗学的反思：关于文学理论转型的一个讨论	(97)
第四章 后殖民批评与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发生	(109)
第一节 后殖民批评的发生	(110)
第二节 后殖民批评与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三个维度	(137)
第五章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	(157)
第一节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90年代	(157)
第二节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参与的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	(169)
第三节 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反思	(178)
结语	(183)
参考文献	(196)
后记	(224)

引言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所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具体而详尽地阐述这些事件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效果却并非我们的旨意。这里仅要指出的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其社会历史发生了转型。^①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对这种转型的具体情状，进行一番简要的叙述：

① 本书的时间段和年份点，除特别说明外，都约定俗成地限定在 20 世纪以内。比如 90 年代，是指 90 年代。依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研究“九十年代”的确是个“短时段”的历史叙事。因此，关于它的研究更多的是鲜活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也不一定就会因为时间距离的原因而丧失合法性。有研究当代的学人因此说：“虽然 90 年代至 21 世纪之初这一阶段缺乏一种时间距离，无法给人们详细思考与反复斟酌留下更多余地，但真相的出现并不由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在第二时间做出的思考，也许并不会强于第一时间做出的判断。它所遗漏的东西可能与它所获取的东西恰好成正比。”（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 页）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当我们强调“感觉结构”对于研究的重要性时，尤其如此。对我们来说，研究当代文学理论问题，同时还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走向自觉的一种表征。以一种学术史的姿态，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进行一番思考，提出一种理解，这是有必要的。不妨再就时间距离问题作一说明。所谓时间距离，其意思并不是说要出现与现在完全无关的距离，它的意思是时间距离可以提供一个去除“假前见”的理解。其实，以阐释学视野看，也没有这种与现在完全无关的距离，同时，也并非缺乏长时段的时间距离就绝对的不能“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其实是因强调的重点不同而致，一个着眼于本体论，另一个着眼于认识论。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的总体旨趣是更强调本体论的，而伽达默尔阐释学之提出时间距离则是试图用认识论来“完善”或“导出”本体论的认识，也就是说，本体论的认识，最终还是需要认识论的参与。没有认识论的认识，本体论的真理（艺术真理）就不能实际地呈现。但是，没有本体论的真理，认识论的认识也会毫无意义。为此，伽达默尔在承认前理解的合法性的同时，又强调前理解也有坏的，即那种偏见式的前理解，因此就需要有效的历史意识和对话观念，强调时间距离也是出于此一考虑。

其一，先看政治方面的转型。某种意义上说，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思想文化呈现出了“去政治”的特征。^①这一点已有不少学人予以指认。比如，孙津将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转型的“去政治”特点概括成为“政治后现代”，并且指出：“当我们从社会转型的意义上理解邓小平关于‘不争论’的发明时，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要我们不去浪费时间争论‘姓社姓资’，其核心含义正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说法和做法本身已成为当前最大的政治了。”^②汪晖则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指出，当代中国的“去政治化过程”有两个特点：“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去理论化’，即以‘不争论’为契机将 20 世纪逐渐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的明确的互动关系转化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二是政党内部的路线斗争的终结，即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将全党的工作转移到‘建设’（而不是‘革命与建设’）上来。”^③应该说，这些论说都有一定的道理，表明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某种政治现实。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去政治”并不意味着一切政治话语的终结。那种党派意义上的政治越来越远离了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活动，不再成为学术活动的“直接”旨趣，但那种公共领域意义上的政治诉求在 90 年代却变得更为强烈，并且以“隐微书写”或“显白表达”的方式予以言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依据的理论

① 1991 年《学人》的创刊，是当时“去政治”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毕竟《学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知识人身份转换的表征。《学人》主编之一的陈平原在创刊号上著文《学术史研究随感》《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时坦言：“不否认这个时候谈论学术史研究，有对八十年代中国学术‘失范’纠偏的意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学人》在 90 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旷新年曾认为：“《学人》以它所蕴含的话语力量内在地、无声地规范了 90 年代学术的发展，一个新的知识秩序围绕它已经默默地生成。90 年代，《学人》已经由一份‘民间刊物’迅速凸显为‘学术主流’。”（旷新年：《无居随笔》，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7 页）多年以后，还有人在回忆《学人》时指出：“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学人》创刊视为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事件：它既是知识者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对政治文化困境的一次决绝的挣脱，又是一次集体退守，即退回到学院体制中，培养和消磨自己的耐心、热忱、智慧及生命。在某些学者看来，前途虽不容乐观，却也不无希望：当知识分子摆脱了对意识形态的依附后，或许能够在学术中寻找、构建自身的独立品格；或许，学术的边缘化正是学术当行本色的回复。”（杨扬主编：《新中国社会与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9—70 页）

② 孙津：《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读书》1992 年第 4 期。

③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纪的终结与 90 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19 页。

基础是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观。在阿伦特看来,政治是区分于劳动、工作的一种行动,它发生在公共领域中,摆脱了目的—手段逻辑,能够赋予人生意义。因此,这里所谓公共领域意义上的政治,主要指的是在公共领域中就某些具有公共意义的学术话题展开讨论所显现的一种政治。^①

当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精神写入了党的十四大报告,并最终在1993年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形式获取最终通过时,它标示的是市场逻辑及其实践已然制度化,这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无疑发生了真实的影响。此时,人们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心绪,生发了对社会现实的较多困惑。正是在这种复杂和困惑中,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公共事务越来越有了某种较为独立的思考,以至于在知识界出现了人文精神讨论、市民社会的讨论、后现代与后殖民之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等等。对此,汪晖写道:“中国的知识界在90年代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辩论,这些辩论构筑的是一个新的模式:第一,辩论并不发生于政党体制内部,而是在知识分子之间;第二,知识分子的思想辩论直接地触及国家变革的方向,从而也在国家变革取向和政策方面产生了影响。”^② 知识分子就公共事务展开讨论,试图以此来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入90年代,一种公共领域的政治的确是在切实地发生。有学人甚至将其视为一股重要的成长中的社会力量。^③

① 需要说明的是,汪晖以“去政治”作为90年代转型的重要原因及表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去政治”说尚需讨论。比如汪晖认为“不争论”乃“去政治”的表征,这似乎是认为80年代以前就有“争论”,有“政治”。然而,有论者曾反问道:“何曾有过争论。”(姚振函:《何曾有过“争论”》,《读书》1994年第10期)陶东风也曾撰文指出,理论论辩或都不曾存在,更遑论有理论论辩的机制了(可参见陶东风《中国有真正的理论论辩吗——评汪晖先生的“纠错”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348be01017szzr.html)。这里借用“去政治”之说,主要是表达政党政治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敏感性,以至于不能“触碰”。还需要说明的是,学术政治与政党政治也并非没有关联,好的政党政治也许与学术政治并不冲突,或也可以说,好的政治乃学术政治与政党政治的合二为一。90年代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学术论辩,一定意义上即是一种好政治的表征,因为没有好政治的年代,学术论辩往往也难以切实地展开(可参见陶东风《中国有真正的理论论辩吗——评汪晖先生的“纠错”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348be01017szzr.html)。

②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2—23页。

③ 施雪华:《建构有成熟规则的中国公民社会》,《学习月刊》2005年第8期。

因此,我们认为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去政治”文化思潮,并不意味着政治死了,更不是说我们要识时务地远离政治,毋宁说是发生了政治的转型。政治的形态变得多样了,一如有学人曾指出的那样:“当代政治概念当然不能不包含阶级问题,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论断并没有过时,但是阶级之外,还应包括地域、民族、阶层、职业、集团、各种社会组织等构成的‘无数的形态’。”^①为此,我们要区分不同的政治形态,辨认出哪一种政治在消失和终结,哪一种政治在发生与兴起,人们避而不谈的是何种政治,又为何不谈,等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八九十年代,面对社会历史的转型,我们有政治方面的更为紧迫的具体问题需要处理,那就是如何“重新政治化”,怎样“重建政治价值”,“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出真正的公共领域和公民文化”^②,等等。^③

其二,再看社会发展方面的转型。由于八九十年代之交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人们越来越感受到那种主要以西方为师的现代化道路难以为继。于是,与 80 年代的那种相对单纯的现代化憧憬不同,90 年代进入了现代性反思之中。从此,人们不再简单地认为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一元的,不再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相比是一个时间上的“先来—后到”的线性关系,甚至不认为中西之间的社会状况存在着等级上的“落后—先进”“好—坏”之别。这也就爆破了以西方为旨归的现代性神话。正如有

① 阎国忠、张艺声:《文艺与政治——一个应重新审视的话题》,《理论与创作》2002 年第 5 期。

②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纪的终结与 90 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57 页。

③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在文学研究界,再政治化问题的研究甚至成为一个热门课题,这可谓是对 90 年代政治转型语境下的文学研究再政治化的一份珍贵的应答。相关文献大致有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何言宏:《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08 年第 3 期。刘锋杰:《试构“文学政治学”》,《学习与探索》2006 年第 3 期;刘锋杰:《文学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三》,《西北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刘锋杰等:《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曾永成:《文艺政治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学人所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思想、学术趋向的最显著特征是，在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研究和争论中，人们一致认同现代性这个价值标准，它的意义被视为是不言而喻的”^①；“在九十年代，现代化仍然是中国的国策，在政治和社会生活层面，它仍然是主流和方向，但在学术层面，现代性往往成了反思、质疑，甚至批判的对象”^②。简言之，因为有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经历，90年代知识人在现代化的想象与认同上发生了改变，他们对中西关系的处理，表现得更为复杂一些，似乎没有了一种如80年代或现代性发生时期的那种历史共识。^③对此，有学人指出，80年代有一个“新时期共识”，即“现代化是西方化”的“发展共识”和个人主体、个人解放乃文化的中心议题的“个人共识”，而随着90年代进入了“后新时期”，其明显的标志就是“新时期共识”遭遇反思，比如，“个人共识”未曾充分展开，但为何却不影响现代化？^④不妨说，这种对新时期共识的反思事实上即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反思，它标明的是整个社会发展出现了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的转型。^⑤

然而，1992年以来，随着市场话语在国家层面的崛起，人们越来越切实地经验到了一个为80年代所召唤的现代化被中断了之后，却又通过新的方式被体制性地实践了起来，那个为80年代所欲求的世俗社会也变换成了一种新的形态而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并切实地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状态。这说明，在社会发展方面，虽然出现了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的转型，但是事实上还是没有完全否认现代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说是在践行有特色的现代化。

面对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转型，由于思维的惯性、身份转换的迟缓、八

① 徐友渔：《学术范式的转换》，载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② 同上书，第17页。

③ 在80年代，诸如现代派讨论、方法论热和文化热等，其主导的方面都是走向现代化，并且这种现代化常常以西方现代化为师，以脱离中国传统为指向。而当人们将“文革”乃至50年代以来的社会实践与封建主义、“去启蒙”相勾连时，这种80年代的现代化共识无疑是确定的。

④ 张颐武：《“新文学”的终结与新世纪文学》，载王宁主编《文学理论前沿》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250页。

⑤ 陶东风：《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复杂心理,以及市场逻辑给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震惊效应等各种原因,不同的群体对这个真实的世俗社会的适应程度和态度取向,表现出了鲜明的差异,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分化,以至于似乎没有可能交往、对话。在这种境况下,人们感受到的是历史总体性的消失,于是,“去历史化”成为了 90 年代之后以至于今的认知经验和心性体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实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潜在的多元化情境使真实的历史面目变得模糊,当然也使历史本质变得难以把握。尽管表象系统依然非常发达,但它与历史/现实的实践发生脱节,‘本质’从历史表象中滑落,这就使表达变成纯粹的表达,变成符号指涉自身的运动。”^①简言之,人们似乎难以触摸到处于转型之中的 90 年代社会历史整体,“阐释中国的焦虑”自打 90 年代以来就已然蔓延开来。^②

当然,这倒也并不意味着面对 90 年代,人们只能失语。虽然要简单

①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9 页。陈晓明甚至做出了“历史终结”的判断,认为“进入 90 年代以来,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历史观念已经处于弱化的状态,与之相关的一整套的历史表象体系和叙事策略也发生根本的变动,年青一代作家以个人记忆为基础,质疑经典的历史叙事或者创建新的非历史化的符号体系,由此表现出新的第三世界文学叙事的特征”(陈晓明:《“历史终结”之后:九十年代文学虚构的危机》,《文学评论》1999 年第 5 期)。

② 张颐武曾在一篇题为“阐释‘中国’的焦虑”的文章中称:“中国似乎已变成了一个无法加以驯服的‘他者’。在这个空间中所发生的一切,犹如一种异常尖锐的挑战,它在嘲弄着我们业已形成的‘知识’。这就构成了一种有关‘中国’的巨大的阐释焦虑。”(参见张颐武《阐释“中国”的焦虑》,《二十一世纪》1995 年 4 月号。另载汪晖、余国良编《90 年代的“后学”论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3—44 页)另外,张颐武还在《二十一世纪》1996 年 4 月号上,撰写了一篇题为“再说‘阐释中国’的焦虑”的文章(另参汪晖、余国良编《90 年代的“后学”论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7 页)。金元浦、陶东风曾以“阐释中国的焦虑”为题对谈,并出版专著指出:“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元的,其结果之一是在知识界产生了所谓‘阐释中国的焦虑’以及共识的消失。知识分子不知道应当如何去把握这个社会,尤其是,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用一种单一的阐释角度与价值标准对这个社会作出完整而准确的解释与评价。这种状况是每一个有志于解读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的现实。”(金元浦、陶东风:《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8 页)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多年以后,经济学学者林毅夫还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论坛上指出,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而国内又未曾有自己的经济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阐释中国的焦虑(林毅夫:《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国经济信息》2005 年第 15 期)。

而又具体地描述出 90 年代社会历史的情状不是那么容易，但我们至少可以用“转型”来阐释并理解 90 年代的社会历史。对此，张颐武指出：“无论如何，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之间已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转型，无论你怎么评价这种转型，也无论你对这一转型怀有怎样的情感，但拒绝承认业已无法继续下去了。”^①这也即是说，转型成为共识，具有无须争论的事实性。^②

二

实际上，在 90 年代的知识叙事中，“转型”的确已然成为一个关键词。^③有学人因此认为：“90 年代被人们普遍公认的命名是‘转型期’：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思想转型、文化转型。”^④但究竟如何命名这种转型恐怕难以达成共识，因为它是一个牵涉阐释框架、参照体系、时空范围等要素的复杂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在八九十年代之内予以比较^⑤；

① 张颐武：《反思九十年代：新的课题与挑战》，《文学自由谈》1998 年第 2 期。

② 刘康、王一川、张法：《中国 90 年代文化批评试谈》，《文艺争鸣》1996 年第 2 期。

③ 经查阅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相关藏书，我们发现 90 年代以来所出版的著作中，带有转型字样的达 1000 种以上。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传播学、伦理学、哲学、美学、文学等各个学科，并业已出现转型经济学、转型社会学、转型法律学、转型传播学等专门的研究领域。另外，以中国知网提供的文献为例，1979—1989 年以“社会转型”为题名的人文社科论文仅 3 篇，而 1990—2000 年以之为题名者则有 1066 篇。其中，1990—1992 年共有 9 篇，1993 年开始逐渐增多，有 12 篇，1994 年则有 44 篇，1995 年有 96 篇，1996 年有 171 篇，1997 年 184 篇，此后社会转型成为稳定的关键词，每年都有百余篇论文以此命名。值得注意的是 1992 年李培林发表了一篇《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 年第 5 期），1993 年有《社会转型范畴的哲学思考》（《学术界》1993 年第 5 期），1993 年 12 月 24 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和文化座谈会”，1994 年《甘肃社会科学》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联合在兰州召开了“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状况与重建”座谈会。可以看出，南方谈话，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让人们普遍感受到了 90 年代社会转型的发生。

④ 王岳川主编：《媒介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80 页。

⑤ 1994 年，在给《二十一世纪》的信中，李泽厚写道：“90 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这很有意思，显现出某种思想史的意义，提示的或是人生价值、学术价值究竟何在，及两者的复杂关系等问题。”（李泽厚：《三边互动》，《二十一世纪》1994 年 6 月号）此后，在大陆探访期间，李泽厚还提及过其所命名的“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之后，渐已流行开来，成为关于 90 年代转型的一个颇有影响之说。

可以在百年之内进行言说^①；甚至可以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段之中予以

(接上页) 社会学研究者孙立平也在此框架中, 得出了一个断裂说。他认为, 与80年代不同, 90年代的社会发生了转型, 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 转到了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 并逐渐定型了一个新的“断裂”式的社会。这个社会最先进的那个部分与社会“失去”了联系, 同时又有一部分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 难以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第1—35页)。

文学研究者谢冕、张颐武、王宁等人试图在此框架中, 阐释出一个“后新时期”说(参见谢冕、张颐武《大转型: 后新时期文化研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谢冕《新时期文学的转型——关于“后新时期文学”》, 《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4期; 张颐武《“分裂”与“转移”——中国“后新时期”文化转型的现实图景》, 《东方》1994年第4期; 张颐武《新空间: 实用精神的崛起——“后新时期”价值的转换》, 《作家》1994年第4期; 王宁《继承与断裂: 走向后新时期文学》, 《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 王宁《后新时期与后现代》, 《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3期)。值得一提的是, 1992年9月12日,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和《作家报》联合发起召开了题为“后新时期: 走出80年代的中国文学”的研讨会(参见白烨《关于“后新时期”文学的研讨》, 《中华文学选刊》1993年第1期)。会后, 《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组织发表了白烨的《“后新时期小说”走向刍议》、张颐武的《后新时期文学: 新的文化空间》、赵毅衡的《二种当代文学》、王宁的《继承与断裂: 走向后新时期文学》4篇有关后新时期的论文。

此外, 在此一框架中关于90年代的理解, 还有“一个时代结束了”(冯骥才:《一个时代结束了》, 《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3期)、“理想主义的终结”(张颐武:《理想主义的终结》, 赵祖谟编:《生存游戏的水圈》,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溃败时代”(陈晓明:《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 《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告别八十年代的光荣与梦想”(王干:《告别八十年代的光荣与梦想》, 《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新意识形态”的重构(汪晖:《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 《电影艺术》1995年第1期; 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王晓明:《半张脸的神话》, 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王晓明:《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 《天涯》2000年第6期), 等等。

① 李泽厚、刘再复在对话中反思了八九十年代之交乃至整个20世纪的革命事件之后, “痛苦地”选择了“告别革命”(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 香港天地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此言一出, 便基本上成为90年代的“基调”, 90年代因此被指为是“后革命氛围”时代。“后革命氛围”是德里克的一本汉语著述名。德里克是这样来描述的:“社会主义是我们所熟悉的, 革命也是我们所经历的, 但这也也许属于已经过去的某个历史阶段, 因为它也许再也不可能产生出所包含的那种集体认同。而另一方面, 它们的遗产则依然有着重要意义, 因为它们所造成的氛围依然存在我们周围, 即使由于新的发展和新的问题已变得复杂起来。”(德里克:《后革命氛围·序》, 王宁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3页)据王宁说, “后革命氛围”并不是一个德里克著述的现成英文本, 而是他与汪民安共同商定, 为德里克编选的一本专题文集(参见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209页)。此文集在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被不少著述转载引用。“后革命”更是成为一个“关键词”“术语”。

审视。^①不过，以转型为视角去完整而具体地考辨 90 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并为其命名，这并非我们的旨趣与目标。我们这里要关注的是，这种政治和社会历史转型语境下的文学理论的存在境况。在我们看来，90 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变化改变了 90 年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社会学基础，使得其无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资源，还是在价值取向、身份认同、功能定位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型。^②这里，不妨简要地述之为三：

① 王一川、张法、张颐武等人认为，90 年代以后是中国文化历经了 1840 年前的古典性阶段、1840—1990 年的现代性阶段之后的又一阶段，即“中华性”阶段（参见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 年第 2 期；另参见刘康、王一川、张法《中国 90 年代文化批评试谈》，《文艺争鸣》1996 年第 2 期）。

此后，王一川曾在其建构的“中国现代学”中又提出了一种现代性分期的理论，认为由于现代性的发展具有长时段的性质，因此有必要根据现代性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将现代性分为如，现代Ⅰ、现代Ⅱ乃至现代Ⅲ。现代性发生以来到 80 年代，是现代Ⅰ时期，90 年代开始走向了现代Ⅱ时段。当然现代Ⅰ、现代Ⅱ之间不存在完全的断裂，而是一种断续的关系。现代Ⅰ、现代Ⅱ的划分，主要根据现代性的起始、动力、主题、特征、地位等多个层面所表现出来的异同（王一川：《中国现代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依此说，也可以得出 90 年代以来的历史时期发生了转型，即中国文化走向了与现代性Ⅰ不同的现代性Ⅱ阶段。

另外，有学人甚至认为，相对于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90 年代发生的转型，是从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参见葛红兵《障碍与认同——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学林出版社 2000 年版）。对此有学人不予认同，但他也承认 90 年代开始了“准个体文化时代”（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9—10 页）。

②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具有学术的特征，以至于关于其的转型之论是一个近乎学术场域之内的问题。因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认为文学理论的 90 年代转型与社会历史转型之间存在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否则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转型问题就会沦为一个非学术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也不可否认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语境影响，特别是当知识生产的自主性依然处在建构的过程之中时，社会历史语境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就会显得更为紧密一些。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的自主性问题，我们基本认同这样一种看法：“在当代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讲，个人的知识活动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智性活动’，也不是西方当代社会中的那种高度制度化的‘个人性’社会实践活动，而毋宁是一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可以据此提出这样一项假设，即这些类型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知识分子或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以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及政治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邓正来：《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正是由于包括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这种自主性特征，使得人们关于其的转型之说聚讼纷纭，难有定论，也因此才值得投以学理的研究。